

二、从世界角度看中国的第一人： 容闳心中的中西文化

从鸦片战争爆发（1840年）到光绪元年（1875年）的35年间，中国人亲历西洋的记载依然太少。虽然在容闳出洋之前，中国也曾有人游历西洋，如林鍼和罗森、斌椿和志刚等，但是林、罗出身市井，斌、志家属于八旗，不仅出洋没有什么抱负和远虑，而且他们的思想之正统远比“布衣”为固，所以他们出洋的记载，并不具有较多的文化反思的价值，充其量只是客观的记录而已。

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方面作出开拓性努力的首推容闳，而容闳之所以能入学读书，并能于早年出国赴美留学，本身就与当时西学东渐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相关。容闳晚年回忆当时弃读经书的经历时说：

惟是时中国为纯粹之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予兄方在旧塾读书，而父母独命予入西塾，此则百思不得其故。意者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至于予后来所成之事业，似为时世所趋，或非予父母所及料也。^①

从1847年1月至1854年11月，在长达8年的留美学习生活中，容闳系统地接受了西学的教育，并以此反观中国当时的现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载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

实，更加感到中国的腐败、黑暗，从而也使他痛苦不已。容闳描述自己当时的认识和心情时写道：

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能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以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能不之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①

面对清廷的黑暗和腐败，龚自珍也曾感到压抑和痛苦，也曾尽吐自己对时局危难的忧虑，但是，这种感受是从唐虞三代的仁政之治的文化心理出发的，这种感受从中西文化冲突的近代课题上看，就只能是盲目和自发的性质。洪秀全由自己的境遇出发而找到基督教福音书，使他能够用西方“上帝”的观念对传统中国的现实进行抨击，但这是借助宗教信仰，常常与历史潮流相去甚远。不同的是，容闳作为中国第一代留洋学子，他是在系统地学习《人权宣言》和微积分等之后，以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民主自由观念为背景来反观中国现实的，所以与龚自珍和洪秀全不同，他的痛苦是建立在知识长进的基础上，建立在中西文化自觉理解的基础上，当然也就深沉得多。

容闳在美学习期间，深感中国的腐败与压制在于文明之不昌，所以他在尚未归国之前便立下了用西学改造中国的宏伟志向。

予意以为，予之一身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载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1页。

心致志以为之。溯自一八五四年予毕业之时，以至一八七二年中国有第一批留学生之派遣，则此志愿之成熟时也。^①

容闳赴美深造8年之后，学成毕业。他放弃了在美国能够获得的公职和优厚的生活条件，毅然回到他并无靠山和根基的祖国，开始致力于西学东渐、以西学改造中学，希冀中华振兴富强。从中西文化交流和比较的角度看，容闳以下的见解和努力，尤其值得重视。

首先是对太平天国事业的看法和评价。容闳一回到祖国，就被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所吸引，他深入到太平军中进行实地考察，给太平天国事业出谋划策，希望太平天国能干出走向新文明的伟大事业来。但是，他失望了。

原因是什么呢？容闳自然看到了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原因在于清朝政治的黑暗与腐败，如他指出：“为1850年革命之原因，则其所见浅陋实甚。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政以贿成。”^②但是，由于太平天国上下的观念没有改变，仍然是旧时代的那一套，所以他们就创造不出新的文化，提不出更高的要求，这样的革命最终依然摆脱不了历史上一般农民起义的旧模式。容闳曾不无深刻地分析了这一点，他说：

革命之在中国，固数见不鲜。闻者疑吾言乎？则试一翻中国历史。其中所谓二十四朝，非即二十四次革命写真耶？领虽如此，战国以外，中国之所谓革命，类不过一姓之废兴，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以故中国两千年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载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2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载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98页。

历史，如其文化，常陈陈相因，乏新颖趣味；亦无英雄豪杰，创立不世伟业，以增历史精神。太平军战争之起，则视中国前此鼎革，有特异之点，非谓彼果英雄豪杰，以含有宗教性质耳。^①

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虽然有重大的政治原因，但是除了它的宗教特色以外，绝无什么新鲜趣味。从太平天国在文化上只能“陈陈相因”，而在实质上只不过属于“一姓之废兴”的旧式革命看，它仍然应被视为旧时代的产物，并无什么增进历史精神可言。容闳的话虽然不免有些偏颇之处，但从总体上看，的确是掷地有声之论。在当时，除了清廷顽固派坚定地站在太平天国的对立面以外，社会上许多阶层都被卷了进去，太平天国所表达的理想和愿望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客观动向，因此当时对太平天国的看法，几乎成了在历史潮流面前判定立场的试金石。而容闳却能从其历史的局限性上深刻地指出它的弊端所在，如果容闳没有西方民主政治这一文化背景作为参照系，这种认识就无从谈起。事实正是如此，当容闳指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不过是“一姓之废兴”，而“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的状况时，也就从中西文化的对立上把问题的实质揭发了出来。

正基于此，容闳感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两面性，它既有革命的一面，又有落后的一面，犹如“埃及石人首有二面，太平军中亦含有两种性质，如石人之有二面”^②。

正是由于这种两面性，所以太平军做了不少背离时代精神的事情。容闳曾指出，太平军将士的主要来源是无业游民，都是些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载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95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载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98页。

社会中最无知识的人，由这些没有知识的人组成的队伍当然不会增加实力，反而会成为太平军的累赘，而使兵力转弱。这种军队既无知识，又无虔诚的信仰，所以在财富与美色面前经不起诱惑，当太平军占领苏杭等地后，他们很快就贪图享受而腐化起来；再加之太平军在自己已经占领的地区里，又不能提出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新政策，所以太平天国的失败就在所难免了。

因此，太平天国的结局就可想而知。容闳从自己的亲身观察中体认到：

以予观察所及，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①

所以，对于中国的意识形态改造和政治改革而言，太平天国的收获就显得微乎其微，其最大的价值，仅仅在于唤起了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

简而言之，太平军一役，中国全国于宗教及政治上，皆未受丝毫之利益也。其可称为良好结果者惟有一事，即天假此役，以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中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②

其次，是容闳从对西方文明的理解中，深感中国的现代化应从教育入手，兼以全面地改革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经济。

容闳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致力于西学东渐的努力中，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传统中国与西方的差距，用西方的价值标准来看，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是那样的腐败、落后和不合时宜，所以都应从西方的文化中获得启发，进行全面的改革，而这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载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00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载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01页。

个改革又以教育为突破口。

所以，容闳一回到祖国，就立即四处奔走，约见各界人士，积极出谋划策，极力倡导派遣大批留学生出洋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主张操办洋务，发展机器工业，要求实行新政策。他曾经不无坚定而自信地指出：

予谓中国不欲富强则已，苟其欲之，则非行一完全之新政策，决不能恢复其原有之荣誉。^①

如是行之数年，则中国行政各机关，不难依欧西之成规，从新组织也。^②

所谓“新政策”，容闳提出的具体办法就是，首先政府至少需聘外人四员，分别作为国家外交、财政、海军、陆军四部的顾问，使中国按照这些顾问的意见重新组织并开展工作；并且，在政府中，应派更年轻的、有才能的中国学生作为这些顾问的助手，使委派的中国学生尽快成长。容闳深信，只要中国虚心听取这些有诚意的外国顾问的意见，按照西方已经证明成功了的模式改革中国的旧政府，那么，不出数年，中国就一定能获得振兴，走上富强之路。然而，当他向两江总督张之洞建议上述办法时，得到的却是言辞“太新太激烈”，因此被拒绝采纳，这使容闳痛苦不已。

在致力于中国幼童出洋留学的努力中，容闳可以说是竭尽自己毕生的精力，虽然其中也有成效，例如毕竟派出了几批幼童出洋留学，但是由于清政府尤其是顽固派的一再阻挠，所以此事也终以失败而了结。在此数十年的努力中，容闳进一步感受到了中西文化大相径庭，更加深了他要改造中国旧文化的决心。

①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载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50页。

例如，当出国留学学生被无端电召回国时，容闳就备感中西文化之别，并且下决心要使中国有一个根本的改革，他曾痛心地说：

学生既被召回国，以中国官场之待遇，代在美时学校生活，脑中骤然变迁，不堪回首可知。以故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明，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①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和回到中国的境遇与感受，其反差竟是如此之大，致使人“不堪回首可知”，这其实正是中西文化在对待人的问题上价值观念的巨大分野。不仅是那些尚未成年的中国留学生感触良多，业已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的容闳更是为之感慨。

其实，问题又不仅如此。就留学与接受西方教育本身而言，也实属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事件，受到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抵触也就可想而知。在容闳的亲身经历中，事实上他一直处在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之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幼童留美受教育问题上，他与中国正统的官员之间发生的分歧和斗争就很能说明问题。

当时被委派为留学事务所的委员共两人，一个是容闳，另一个是陈兰彬。容闳是西学东渐的倡导者和力行者，而陈兰彬则是顽固派的典型代表，容闳对陈兰彬的种种做法和观念的评议正表现出已经获得西方文化观念的人对仍固守传统观念的人的剖析，这正是中西文化冲突的典型反映。

陈兰彬出自于对中国传统圣道的维护，所以他将中国留学生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载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 1985 年版，第 144 ~ 145 页。

在美国受教育本身就看作离经叛道，因此一再将其指控为“污染”，要求予以废止。容闳则出于西学东渐、文化交流的目的，站在振兴中华的立场上，对这种所谓“污染”论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容闳指出：

陈兰彬自华盛顿后，与哈特福德永远断绝关系。因有以上种种原因，故其平素对于留学事务所，感情极恶。即彼身所曾任之监督职务，亦久存厌恶之心。推彼意想，必以为其一已所受纯洁无瑕之中国教育，自经来美与外国教育接触，亦几为其所污染。盖陈对于外国教育之观念，实存一极端鄙夷之思也。^①

陈兰彬对西学的厌恶和鄙夷正是当时清廷和一般士大夫普遍存在的文化心理定式。他们从文化自我中心的观念出发，自然以为唯有传统中国的圣学孔道才是世界上唯一纯正无瑕的学问，那么，与中国传统不同的西学能有什么好处吗？于是，与外国教育相接触就被讥为“污染”，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但是，这丝毫不能说明中学与西学孰优孰劣，原因是正沉醉于中学中的人由于习惯于服从和俯首，当然只能以极端封闭的心态来对待异质的文化。陈兰彬的态度正好表明了这一点。容闳说：

盖陈之为人，当未至美国之前，足迹不出国门一步。故于揣度物情，评衡事理，其心中所依据为标准者，仍完全为中国人之见解。即其毕生所见所闻，亦以久处专制压力之下。习于服从性质，故绝无自由之精神与活泼思想。^②

陈兰彬的态度，也就是当时一般士大夫和官绅的态度；陈兰

^{①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载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37页。

彬对待文化的价值判断，也就是当时一般士大夫和官绅的价值判断。可以想象，在如此浓重的、刻骨铭心的文化偏见氛围里，过早地接受了西学文明的容闳的西学东渐之努力究竟能坚持多久，能得到几多的收获？容闳在历经艰辛之后，愈益感悟到，如果没有政治的民主化，只靠教育自然是救不了中国的，而中国富强的愿望也就只是空谈而已。于是，容闳在倡导留洋和办洋务失败之后，自然地走上了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一道谋求变法的新道路。

从教育入手，到办洋务，再到变法，容闳致力于西学东渐的努力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他日益接触到中国社会的病根所在。但是，容闳的先觉并没有引起国人的普遍觉醒，他的西学东渐的努力受到了中国社会文明程度的制约。他满怀豪情毅然回到祖国，要为中国振兴富强并成为欧美那样的新国家而奋斗，但是，到头来不仅国家没有振兴，连他本人也不得已在垂暮之年又一次背井离乡返回美国，直至饮恨辞世。这与其说是他个人的不幸，倒不如说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三、王韬笔下的文化差距

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里，能够从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中，王韬是尤其值得提及的先驱者。

王韬的经历与容闳的不同之处在于，容闳从小接受的是西学的教育，后来赴美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直至大学毕业，以至于他在美国学成归国时，竟一时不会用中文讲话。而王韬则不同，他出生吴地，从小接受的是传统的教育，17岁便以全县第一名的好成绩考中秀才。只是由于他贪恋酒色，在省城乡试失败后，才抱着“读书十年，然后出为世用”的雄心潜心钻研学问。1849